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吳的经过.....	何柱国 (1)
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	王維城 (34)
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	于立言 (49)
国民軍倒曹之真相	李仲三 (53)
馮玉祥北京政变中的一幕	张俊声 (57)
关于国民軍的几段回忆.....	何 遂 (63)
关于李景林与国民軍	韓玉辰 (77)
我在张、吳合作中的亲身经历	苏錫麟 (82)
我被国民軍逮捕和脫走的经过	曾毓雋 (89)
国民軍南口战役亲历記.....	张樾亭 (100)
我隨奉軍参加南口战役之回忆	郭希鵬 (114)
閻錫山参加直奉反馮的经过	周 珉 (123)
奉晋两軍涿州之战	岳 超 (139)
国民軍第二师刘郁芬部在甘肅	张寿齡 (146)
宋哲元杀戮陝軍俘虏五千人目击記	张宣武 (162)
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顧問.....	陶尚銘 关根勤 (175)
松室孝良和馮玉祥的一段关系	吳錫祺 (186)

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	于学忠遗稿 (193)
我由反奉到投馮投吳投蔣的经过	魏益三遗稿 (215)
我所知道的王占元	郑廷璽遗稿 (252)

质疑·补充·訂正

对«一九二八年天津中美商人串通的

大騙案»的补正.....刘孝忱 (269)

关于肃順职位和处死資料的訂正

孟 和 (270)

对«齐卢之战紀略»的补正

严宽甫 (271)

关于«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和«齐卢

之战紀略»的訂正.....蔡一鸣 (273)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的补正

溥 杰 (274)

对«吳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敗»的訂正

邓汉祥 (275)

关于孙中山、段祺瑞会晤的更正

陸丹林 (276)

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	于学忠遗稿 (193)
我由反奉到投馮投吳投蔣的经过	魏益三遗稿 (215)
我所知道的王占元	郑廷璽遗稿 (252)

质疑·补充·訂正

对«一九二八年天津中美商人串通的

大騙案»的补正.....刘孝忱 (269)

关于肃順职位和处死資料的訂正

孟 和 (270)

对«齐卢之战紀略»的补正

严宽甫 (271)

关于«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和«齐卢

之战紀略»的訂正.....蔡一鸣 (273)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的补正

溥 杰 (274)

对«吳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敗»的訂正

邓汉祥 (275)

关于孙中山、段祺瑞会晤的更正

陸丹林 (276)

回国 遺缺由今田新太郎中佐接充。

松井七夫任期屆滿，日方派柴山兼次郎接替。张学良当时，同日本有杀父之仇，但又不敢对日方有什么作为，对日本顧問則采取了冷淡态度。日方为了爭取恢复张作霖时期的顧問与东北最高当局的密切关系，調走土肥原以后，总是派来善于应酬或性情“溫和”的人，柴山便是个典型。他作事圓到，表面上肯負責任。九一八事变前不久，张学良派他去日本，嘱他多带些錢去，請請少壯軍人，打听关于統一中日两国的枪枝口径的事。他又說，日方常怪东北軍不买日本軍火，要柴山筹划购买一批，够装备一个騎兵旅和一个卫队师用的。大概张学良想用这些来緩和和他同日本的关系。柴山去日本时路过沈阳，分別去見參謀长荣臻和日本关东軍參謀长三宅少将，希望双方約束部下，不要发生武装冲突。从这件事看，关东軍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柴山是不知道的。帝国主义使用間諜，除了十分必要，它本身的重要行动是不会事前通知間諜的。傳說日本顧問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曾“忠告”东北地方当局，赶快把中日各項悬案解决几項，否則拖下去可能引起更大的麻煩。由于这一傳說，因此有人推論，日本顧問对张学良还有半片忠心。实则九一八事变，日本顧問于事前不会晓得，他們的“忠告”也只是以“关切”态度，慫恿东北当局对日本屈服罢了。我們且看一下日本顧問的下落：

菊池武夫、本庄繁、土肥原賢二都成了侵华战争中的首恶，仪我作过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今田新太郎作过侵略海南島的日軍參謀长，荒木五郎作过日本天津駐屯軍情报員。张家父子用中国人民的汗血喂肥了他們，他們轉來噬中国人民。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駐华使館武官永津中佐帶翻譯來見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吳的經過

何 柱 国

(一) 酝酿期間

从曹、吳倒段說起

我这里說的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吳，就是人們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軍閥混战时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混战，它的特点不仅在于战争的范围几乎牵涉到全国各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有南方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的参預。这一战役，我除了在作战期間担任奉軍一、三联軍作战科主任之外，还在酝酿期間参預了某些方面人物的接待，因此不但軍事方面知道一些情况，而且政治方面也有过一些接触。不过事隔多年，有的已经忘怀，有的記憶不清。現在就我所能回忆得起而且确信无疑的一部分材料写出来，作为文史工作部門的参考資料。

1920年曹、吳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統徐世昌的祖奉，奉軍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軍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軍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得以亲奉的梁士詒組閣。曹、吳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一时无可如何，因此乃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軍的失敗。奉軍失敗之后，退縮到山海关外，整軍经武，力图报复，自不待言。曹、吳战胜之后，一面恢复旧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贿选曹錕为总統；同时由吳佩孚坐鎮洛阳，实行武力統一。不到两年，全国范围内尚

未为曹、吳所吞并且敢与曹、吳对抗的实力派，除山海关外的奉张之外，只剩下南方孙中山所领导的一部分民主革命的力量，和孤立和华东一隅的段派残余浙江的卢永祥及上海的何丰林。曹、吳实行贿选，全国譁然，于是国会中拒贿的議員相率南下，成立非常国会，因此有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統率的北伐之师。孙中山的北伐，虽因内部混乱而遭受挫折，但至1924年春声势复振，乃利用北洋軍閥内部矛盾，与北方反对曹、吳的各方面遙相呼应，共同对付曹、吳。至于段祺瑞，自1920年被曹、吳推倒以后，从未忘怀东山再起，加上始終忠心于段的卢、何又处在苏、皖、贛、閩四省曹、吳势力的包围之中，岌岌可危，因此凭他北洋首脑的身份，四面八方拉攏关系，拼凑实力，积极策动推翻曹、吳。孙、段、张联合打倒曹、吳的形势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北洋軍閥統治时期，每一軍閥都有他的国际背景，因此每一次内战，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插手其中，打倒曹、吳之役，当然也不例外。大家知道，当时曹、吳走的是英、美路线，段、张走的是日本路线。段祺瑞在天津日本租界内用以与各方联系的电台，就全部是日本代为架設。我們在前线作战的紧要关头，也曾收到过段氏由这电台发来的头等重要的軍事机密情报，影响战局甚大(詳后)。

奉軍的整軍经武

1922年奉軍战败退縮到山海关外之后，积极整軍经武，著有成效，这不但是1924年打倒曹、吳的张本，而且奠定了以后整个东北軍的基础，就东北軍建军的历史說，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个人正在奉軍开始整軍经武的时候投身进去，而且参預了这一工作几乎全部的过程，因此只要把我自己所見所聞和所作的一切交代清

楚，就不难窺見当时奉軍怎样整軍经武的一个梗概。

1919年我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国之后，担任保定軍官学校队长之职。保定軍校历任校长，从第一任蔣方震起，直到孙树林为止，都是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曹、吳得势之后，改派张鴻緒为校长。张是北洋老武备出身，接任校长后，有意排挤上官一派，因小过开除了士官派的戴联璽和楊正治，激起风潮，結果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們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錢大鈞和黄琪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璽、楊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則去东北投向奉軍，我也是去东北的一个。

当时奉軍以楊宇霆、张学良、韓麟春、姜登选和郭松齡等为核心，大事招兵买馬，大量吸收各国陸軍留学生和国内陸大、保定軍校等出身的軍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內各方面担任軍职的人。他們吸收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地招攬进去。我个人就是通过当时在三、八旅中充任炮兵团长的日本士官同期同学邹作华的关系而被招攬的。我选定去东北这条路，当时除了同学援引之外，自己有三个目的：第一，我学的是騎兵，认为去东北正好施展自己的所长；第二，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第三，为了自己有带兵的机会。这第三个目的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北洋軍閥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參謀之类的幕僚，独有奉軍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我記得1923年我从东北回到北京結婚时，我的叔岳父賈德耀^①

① 我的岳父是賈德耀的胞兄，早死，我妻由賈撫养长大，視同亲生，故称叔岳父。他是馮玉祥的把兄弟。馮玉祥給我证婚。

對我說：“你在東北是個中校，如果願意轉到馮的方面來，可以立即升為上校。”問我意下如何？我就直截了當地以在東北有機會帶兵，而馮的方面無此機會為詞回絕了他，並且得到他的諒解。從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奉軍的招兵買馬究竟是為什麼，憑的什麼，去東北的又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物，他們是為什麼去的。

我是1922年7月到東北的。一到東北，僅由三、八旅的副官長高紀毅接待，還沒有見到過統帥部的任何主要人物就被分配在當時的陸軍東北講武堂擔任教官兼隊長之職。我任職之後，慢慢地摸清了各方面的人事關係和整軍經武的具體內容，今就記憶所及，概述于下。

首先，我要談談奉軍新舊兩派的消長。舊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人們熟知的張景惠、吳俊陞、孫烈臣、張作相和湯玉麟等跟張作霖一起打天下的眾好漢。新派人物是楊宇霆起的頭。楊是東北法庫人，日本士官八期畢業，為人精明幹練，勇于負責，從1918年繼張作相為統帥部的總參議，始終得到張作霖的特殊信任。就是由楊宇霆先後吸收了韓麟春、姜登選、郭松齡、戢翼翹、臧式毅、于國翰、熙洽、王樹常、于珍、邢士廉等成了新派的骨幹。後來張學良又以少帥的身份列入新派的首腦，並由張學良和郭松齡分任新軍主力三、八旅旅長。從此新派逐步抬頭，逐步壯大，終於成為以後整個東北軍的主體。然而新派之所以能壓倒舊派，也並不是偶然的，其中至少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922年的直奉戰爭，奉軍舊派的軍隊在長辛店作戰，新派的三、八旅在楊柳青以西作戰，結果長辛店方面的舊派軍隊潰不成軍，而楊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則雖敗而未潰，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陸文團在山海關的浴血奮戰。原來奉軍在長辛店和楊柳青戰敗以後，直軍以破竹之勢直追到山海關，滿以為一舉可

以搗毀奉張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關石門寨之線，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陸文團的猛烈抗擊。王部戰鬥力之強，遠遠超出曹、吳意料之外。結果雖然王陸文團長陣亡，全團官兵也損失甚重，但畢竟阻止了直軍的攻勢，穩住了整個奉軍的陣腳，迫使曹、吳不能不有所顧忌而接受了和議。這兩件事不但博得了張作霖的特殊賞識，並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舊派相形見绌，不得不在軍事上有所退讓。因此以後的整軍經武，事權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並且逐步伸入到舊派軍隊，使舊派軍隊也起了變化。所以全部整軍經武的過程，其實也就是新派抬頭和壯大的過程。

其次談談整軍經武的重要機構和重要的人事部署。第一個重要機構是陸軍整理處。這是整軍經武的最高執行機構，凡屬部队的整編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遷等都由這裡主辦。除了最高決策由統帥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關整軍經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過這裡。因此由張作霖自兼統監，下設副監多人，新、舊兩派都有，但實際負責的是副監姜登選、韓麟春和參謀長張學良。第二個重要機構是陸軍東北講武堂。這是軍官的教育和訓練機構，由張作霖自兼堂長，張學良兼監督，並由中、日兩個陸大畢業的福建人蕭其煊以教育長名義代張學良負責，下面的教官和隊長就是我們從保定軍校轉過來的二十餘人為中心的。我個人也就是在這裡任職時比較認真負責，博得好評，由此逐步得到張學良的賞識和信任，最後成為張學良手下的重要幹部之一。第三個重要機構是三、八旅整編的二、六旅。三、八旅在楊柳青和山海關兩役損失甚重，整編為二、六旅後，不但人員槍械補充齊全，而且官兵都經過挑選，裝備又全部是最新式的，所以把它作為全軍的示範部隊，仍由張學良和郭松齡分任旅長。無論整編前的三、八旅或整編後的二、六旅，兩旅

都是不分家的，并且一直都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以后郭松龄倒戈，妄想取代张氏的地位，他凭的就是这个资本。第四个重要机构是东北兵工厂。这厂由楊宇霆兼任督办，早已設立，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规模不大，以后则大事扩充，不但能制造一般枪械弹药，而且能造山炮、野炮，尤其是增設了一个八二口径的迫击炮厂，炮筒皆以自来水管名义进口改装，价廉物美，后来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效能。最后一个重要机构是东北航空队，由张学良主管。东北航空队原由1920年倒段之役瓜分段派的空军而来，但以后东北航空队改用了欧战以后法国的最新飞机，教官和教材也都是法国的，而曹、吴的飞机则仍旧是段派遣留下来的陈旧之物，没有什么刷新。此外还有训练军士的教导队和吉、黑两省輪訓旧派军队下级军官的军官养成所等，不必细述。

再次谈谈军事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重要措施之一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我也就是凭了这一条后来得到带兵机会的。此外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的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因此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最后还不能不提一提财政经济方面的情形。奉军以关外一隅之地，与关内据有大半个中国的曹、吴对抗，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呢？原来东北农产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大豆出口，因

此经常是一个出超的地区。奉軍就是凭了这个出超的条件，加上自己在东北的政治淫威，发行了一种不兌換的奉票，这种奉票起了很大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可兌換的紙币，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現金或相等于三分之一現金的实物作为儲备，否則紙币不能穩定。可是发行不兌換的奉票，虽然也要出超这个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額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額的現金或实物作为儲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紙币（当然不是沒有限制）。东北的财政能够承担那样巨額的支出，秘訣就在这里。此外还要提到一件事。大家知道，奉軍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互相矛盾又互有勾結的。东北的财政经济有沒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援呢？我沒有主管过这方面的事情，不敢下断語。

以上就是奉軍整軍经武的梗概。奉軍经过这样的整軍经武，仅仅两年工夫，就改变了全軍的面貌，由过去綠林式的烏合之众一跃而为訓練有素的正規軍。

孙、段、张的結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张一面整軍经武，一面即与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段祺瑞进行結合。

当时东北方面負責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是河北人，日本士官五期毕业。民国初年朱庆瀾任黑龙江將軍时，他任朱的参謀长，后来朱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緣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先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見譚延闓，譚派人回訪，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韓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韓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凱的女婿楊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

北与张氏父子商議討伐曹、吳的大計，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討伐曹、吳的实现。关于姜、譚互派信使和韓麟春的广州之行，詳情我已記憶不清。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汪精卫和伍朝枢的北来，分述如下。

汪精卫是1923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楊宇霆、韓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議討伐曹、吳的大計的。据說汪精卫首先提出軍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討伐曹、吳，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吳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吳。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議，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統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領会，可以說是无形中取得了協議。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討伐曹、吳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會議解决国家的統一和建設的問題。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軍事上如何打垮曹、吳，至于打垮曹、吳后如何解决政治問題，其实胸中尙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問題重要。因此当时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說只要打得垮曹、吳，什么都好說，既未明白表示贊成国民會議，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這個問題只能当作是个悬案。

伍朝枢是1924年初夏来到东北。我不但参預接待伍朝枢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会說广东話，经常都是我陪他見客，陪他参观兵工厂、航空队和讲武堂等軍事机构。我从伍朝枢参观各軍事机构的認真細致和不厌其詳地問起有关軍事的各項詳情看来，估計他此来除进一步联系有关討伐曹、吳的具体步驟之外，还負有考察奉軍

的实力，要向孙中山彙報奉軍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作战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我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到、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軍实力的东西。可是有一桩事情被他难住了。有一天，他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語气問我：“你們奉軍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我当时心里很奇怪，觉得他問起别的都很內行，独有这一問，却問得沒来由。因为，老实說，当时絕大多数的奉軍官兵，对于三民主义都是毫无所知的，哪里談得上信仰不信仰呢！因此我沒有思索就天真地回答說：“我們奉軍官兵只有少帥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談不到的。”不想这一回答給了他很大的震动，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我追問：“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这一来我才知道他的問話很严重，但我話已說出，收不回来，只好老老实实地說出我自己的見解。我大意是說我們奉軍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禍同当，也就能打仗，并且举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例。伍朝樞听了我的解释，紧皺着眉头，不发一語。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是很失望的，但我心里还不相信自己的說法有什么大錯处。事后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张学良，他却滿不在乎地說：“他們自然有他們的一套，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各不相干。”

以上就是有关孙、张結合的一些片断。这当中关于姜登选与譚延闓的联系和孙中山先派汪精卫北来，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譚延闓給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遺物中检出。当时我們检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給各高級將領作为紀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現在把它附在这里。当韓麟春去广州

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錕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錕。这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起码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贵的。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1. 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頃誦手书，借悉一切。所論奉省暫持冷靜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頃致书尊公，述此后軍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險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搗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絕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見不謀而合。望力持定見，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預期也。韓芳辰君来，連日討論，悉东三省整軍經武，养銳待发，曷胜忻慰。茲特倩汪精卫先来謁，一切代述。希賜接洽为荷。专复，敬頌 台綏

孙 文 九月二十二日

2. 譚延闓給姜登选的信

超六仁兄惠鉴：

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具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賢豪固自不凡也。自頃成君济安来粵，复詳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粵，国事螭蟠，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誠，相与始終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請 勛安

弟譚延闓啓 三月十六日

（超六是姜登选字。成济安，湖南人，曾为北京世界日报記者。余人未悉）

至于段、张的結合，我直接的接触甚少，不过就当时奉軍一般上层干部所能得知的情况，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

张作霖原是袁世凱底下三十六鎮中的第二十七鎮，虽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統，但也属于北洋，所以段、张的关系本是北洋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从头到尾是个亲日派，奉张也是亲日的，所以在对日的关系上，段、张早已成为好搭当。不过在对內的派系斗争中，段、张的进一步亲密，則是起源于1918年秦皇島的劫械。那时段派正在大事扩充实力，特别是徐树錚正在大搞其西北边防軍。而段的政敌馮国璋也不示弱，正在千方百计地搞軍队。恰好馮国璋从国外购进一批軍械，将在秦皇島卸下，事为徐树錚所偵知，乃以日本士官同学关系跟楊宇霆秘密商議，議定由奉軍派兵去秦皇島劫械瓜分。結果劫械成功，平分了軍械，从此段、张成了亲密的伙伴。1920年曹、吳倒段之役，奉张虽与曹、吳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奉张只是在段派瀕临倒台的时刻才进军关內，唾手而得京、津，表面上参加了倒段，实际只不过是曹、吳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奉张这一行动，段派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奉张不来，不但段派的家底将全部落入曹、吳手中，而且北京政府的政权也将为曹、吳

所独占，这对段派是不利的。事后段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即可想见段、张的关系并未中断。因此到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段、张之间即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当时段派失意政客给段四面八方跑腿的人是很多的。以我所知，联奉的主将是他的亲戚吴光新，联馮的主将则是我的亲戚賈德耀。我所知道有关段派的一鳞半爪，很多就是由賈口中得来的。此外，孙、段之间也早有联系，不过我只知道主要的引线人是許世英。

（二）作战经过

浙沪联军打响第一炮

反直之战，最后打败曹、吴的是我們奉軍，但第一炮是段派的卢永祥和何丰林的浙沪联军打响的，浙沪联军和孙中山的北伐軍起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因此在說到直、奉两軍的决战以前，不能不先简单扼要地提一提浙沪联军和北伐軍。

1924年9月初，卢永祥一面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同时即与齐燮元軍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我还记得很清楚，卢永祥打响第一炮的第二天，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并且立即开始軍事行动；第三天孙中山也就发表宣言，宣布即日移师北指。可见孙、段、张的联合早已成熟，軍事方面也早有成議。我們奉軍的胜利，与孙、段的配合，从头到尾都是分不开的。

卢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統，段派嫡系，始終拥段，要算是段派的最后一点实力。因此以齐燮元为首的苏、皖、贛、閩四省的曹、吴势力步步进迫，必欲去此眼中之釘。而段氏也正为此更加积极地四面八方策动反对曹、吴。当时齐燮元和孙传芳等借口反对卢、